



略谈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入藏的善本书

李致忠

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极为丰富，中外知名。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筹建的京师图书馆。草创之初，清廷即拨原国子监南学和内阁大库旧藏于京师图书馆，此为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基础，也是善本珍藏的滥觞。不久，京师图书馆又典藏了敦煌石室写经八千馀卷及南陵徐氏积学斋和归安姚氏咫进斋旧藏。一九一三年九月，经当时教育部呈请国务院照准，又将清代翰林院原藏《永乐大典》残帙六十册，拨交京师图书馆。一九一四年，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原藏《四库全书》运抵北京，当时的内务部决定运往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后经教育部与内务部反复交涉，于一九一五年，《四库全书》连书带架带函全部移交京师图书馆。此后几十年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续有收藏，但因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北京图书馆的从业人员虽极力搜求，入藏却极为有限。有的甚至眼看珍贵的文化典籍流往国外，自己却束手无策。例如陆心源所藏宋楼的珍贵藏书，在外流之前，曾先与京师图书馆接洽，如价钱合适，还是愿意出让给京师图书馆的。但由于京师图书馆财力不敷，无力购买，只好坐视这批珍贵的善本东流日本，迄今回首，仍是憾事。所以，自一九〇九年动议筹建京师图书馆，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积四十年之努力，全馆藏书不过一百四十万册，而其中的善本珍藏，包括甲乙两库在内，不过十三万册左右。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太行行署的军民就抢救保护过《赵城金藏》。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代表党中央和总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注意保护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和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刚刚解放，北京图书馆刚刚回到人民的手中，党和政府就注意到了它的藏书建设。当时的北京市文管会文物部，即时呈请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批准，通知太行行署将抗战时期抢救下来的《赵城金藏》运至北京，移交北京图书馆典藏保管。《赵城金藏》是金代山西崔法珍断臂募捐雕印的一部功德经，全经凡七千馀卷。经印好后，长期保存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又刻版于金代，故称为《赵城金藏》。

我们知道，中国佛经的雕印始于唐代，但整部大藏经的雕印则始于北宋太祖开宝（968—975）年间。“藏”字在梵文中是个大花篮的意思，“藏经”意将释家诸经典都汇于一个花篮中，也就是汇刻在一起的意思。宋太祖开宝年间在四川雕印的大藏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刻的释家经典大丛书。因其刊行于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又因其雕板于川蜀，故又称为《蜀藏》。《蜀藏》的雕印，非但在佛教史上很重要，在雕板印刷史上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惜，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零帙而已，全藏则早已不复可见了。但《赵城金藏》的雕印，则是直接以《开宝藏》为蓝本照式翻刻的。因此，《赵城金藏》的地位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它不但在大藏经的雕板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在佛教史的研究上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且辽金书禁甚严，能流传至今者屈指可数，《赵城金藏》的传世，于保存金代刻书的标本方面，亦有鲁殿灵光之耀。

《赵城金藏》是一九三三年被发现的，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本想影印行世。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不重视文化遗产

的发扬，学术界的愿望成了泡影。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入侵山西的日本侵略军企图抢劫这部举世孤罕的大藏经。广胜寺的老和尚得此消息后，立即报告了赵城附近的八路军领导机关，呼吁抢救这部大藏经。我太行行署经过请示上级，立即组织军民昼夜兼程，将大藏经运离广胜寺，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为了防止战火的不虞，《赵城金藏》又被转入了山洞煤窑。到一九四九年运往北京时，许多已经霉湿粘连，成了木炭棒模样。北京图书馆典藏这部大藏经后，特请四名装裱老师付，以十几年的精心工作，用特殊技术，一一把它们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北京图书馆现藏《赵城金藏》四千八百余卷，是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中的特藏，也是举世瞩目的珍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就以这部《赵城金藏》为底本。

敦煌石室写经八千余卷，是京师图书馆时期旧有的专藏。陈垣先生编制的《敦煌劫余录》，反映了这部分藏品。但众所周知，京师图书馆典藏的敦煌石室写经，的确是劫余之物。年代早、首尾俱全、学术资料价值较高的，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携往伦敦与巴黎，剩下的多系残篇短章。因此，北京图书馆对于敦煌石室遗书的搜集向来不遗余力。五十年代，与大英博物馆达成协议，用我们所藏八千余卷的胶卷，换回了斯坦因携走部分的缩微片子。八十年代的最初二年，又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达成协议，用同样的办法换回了伯希和携走部分的缩微片子。如果能有机会再与苏联和日本进行交换，那么敦煌石室所出遗书，将有百分之九十汇于北京图书馆。那样，对敦煌学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对于敦煌石室遗书的搜集，除了上述国际间的交换以外，对于散在民间、单位的原件则更加悉心收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图书馆接受国家拨交、私人捐赠以及自己访购，先后又入藏敦煌石室遗书一千八百余件，其中包括汉、藏文写经和四部书

的写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遗书已达一万一千件，这也是世界瞩目的珍品。

一九四九年以前，北京图书馆只藏有六十四册《永乐大典》，基本还是京师图书馆草创之初由清廷从翰林院拨交的那个老底。到建国初期，北京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增加到了一百十册。新中国的建立，使全国和谐，文化昌盛。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和藏书家、藏书单位，从全局出发，非常开明，纷纷捐赠《永乐大典》。一九五一年，由张菊生老先生倡导，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将该馆涵芬楼多年收集的《永乐大典》二十一册，全部移交国家，交由北京图书馆典藏。这二十一册中有酈道元《水经注》四册。原来明初在编纂《永乐大典》时，全文辑录了酈氏的《水经注》，共有八册。商务原藏这四册只是《水经注》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还有四册原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九五八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全局出发，将后四册也移交北京图书馆度藏，从而使《大典》本《水经注》久分而璧合了。

张元济先生此举影响极大，各地藏书家闻风而起，周叔弢、赵元方、金梁诸先生，都先后将自己珍藏的《永乐大典》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到一九六二年，远在广东的锺弘毅先生又将家藏《永乐大典》三册捐献给国家，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一九八三年初，山东掖县文化馆又将从民间收到的《永乐大典》一册捐献给国家，入藏于北京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一九五一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率先将帝俄时期携走的《永乐大典》十一册归还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典藏。一九五四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又将抗战末期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时携走的原满铁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五十二册，送还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亦拨交北京图书馆典藏。同年，苏联科学院

又将帝俄时期携走的《永乐大典》一册归还我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亦被拨交北京图书馆典藏。一九五五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问我国，把德国来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三册移交我国，入藏于北京图书馆。

建国三十五年来，单位拨交、外国归还、私人捐赠，入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凡一百一十一册，加上原来的旧藏，总计已有二百二十一册。《永乐大典》全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九十五册。但自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横遭浩劫，迄今为止，尚存于人世的，全世界不过四百册，仅占原书的百分之三多一点。北京图书馆分藏二百二十一册，是现存《永乐大典》的最大藏家。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确保文物图书不受破坏和严禁走私外流，政务院适时地制订了文物图书保护法令，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文物图书在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地位。政务院的这一正确措施，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文物图书的重视，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更赢得了许多藏书家的拥戴。他们认为，多年来以个人之力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抢救下来的祖国珍贵文化典籍，正是为我们的民族、国家保存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民族独立了，我们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这些典籍应该归还人民了。例如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双鉴楼旧藏宋刻本《资治通鉴》和宋抄本《洪范政鉴》，于一九四九年傅先生辞世后，便由其后人遵遗命捐赠北京图书馆。傅氏捐书倡议于前，铁琴铜剑楼瞿济苍伯仲、周叔弢、翁之熹、刘少山、刑之襄、赵世暹、赵元方、高君箴、许广平、郭沫若、吴梅、张芝联、齐如山、徐祖正、闻家驊诸先生暨潘氏宝礼堂等继之于后，纷纷以深切的爱国热忱，慨然捐赠珍本善本图书、手稿及藏书。这些藏书家及学者，有的是几代家藏，保存了百年以上；有的是瘁一生精力所聚，什袭珍藏。如翁氏所捐之明钞本《北堂书钞》，赵世暹所捐

之宋刻本《金石录》等一大批宋、元精本名刊，及明、清精刻和抄校题跋之书，先后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不但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在质量上也大大提高。他们这种化私为公，慨然捐赠珍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楷模风范。特别是周叔弢先生、孙孟晋先生等，事迹更为感人。

周叔弢先生，是天津著名的藏书家、鉴赏家和版本学家。他平生嗜书如命，精于鉴赏，锐意搜求，一生精力所聚，唯在珍藏。他的藏书非但版本考究，书品尤求精良。像南宋绍兴九年刻本的《汉官仪》、元至大刊本的《梅花字字香》、元至正刊本的《梅花百咏》等，不但是传世仅见的孤本，而且书品大方古朴，刻印精工。建国之初，周先生感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振兴，于一九五二年慷慨地将毕生辛勤收藏的最精品宋、元、明抄校本书七百十五种共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全数无条件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这是多么崇高的义举啊！

周先生不但把自己的珍贵藏书捐献北京图书馆，而且始终关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建设。一九七七年春天，唐山地震的余危尚未完全解除，天津还处在防震抗震中，周先生却不顾八十几岁高龄，兴致勃勃地关心起一部残书来。那年，天津古旧书店收进一册宋刻本《春秋繁露》。先生得知后亲自过目，确认此册与北图所藏该书残帙当属同一版本，当即嘱托古旧书店负责人张振铎同志，此册不要出让别人，应当归藏北京图书馆，成全一部书。随后，先生便托人带信给北京图书馆，邀请北图派人到天津鉴定购买。北图同志带上先生的亲笔信，到天津古旧书店顺利地购置了那册宋刻《春秋繁露》。回到北京，与原藏该书残帙一核对，非但是同一版本，而且是同一版本中的同一部书，北图原缺开头两卷正是此册。一部失散多年的宋版书，由于先生的鼎力相助，又成了完璧。先生于版本之精通，于北京图书馆藏书建设之关心，

由此可见。

赵元方先生也是北京图书馆的老朋友。他辞世前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参事，几十年从事银行工作。抗战期间，他目睹日本人盗购中国文化典籍，极为痛心，乃毅然出卖自己几十间房子，极力搜集珍本善本书，以求不使外流。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出于爱国热忱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过《永乐大典》，捐献过精抄精刻精印的善本书，及活字印本书，也成批地出让过善本书。赵先生下世前，于老病缠身，起坐行动都很困难之中，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书。北京图书馆派人表示感谢，先生仿佛多年遇知交，于书林掌故津津乐道。

郑振铎先生是著名的学者、藏书家，文化部前领导之一。一九五八年赴苏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于万里长空中。郑先生逝世后，夫人高君箴同志将郑先生毕生所集十万册古本书捐献北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中短缺之戏曲、小说、宝卷、文集等文学作品得到了极为可贵的补充。

一九七二年，北京图书馆接到夏鼐先生来信，说是杭州夏承焘先生函告他，孙孟晋先生想把家藏旧刻《尹文子》捐献国家，希望北图派人接洽。一九七二年夏，北图派人专程赴杭，拜见孙孟晋先生。孙孟晋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孙诒让的后人。孙诒让玉海楼藏书多为实用之书，版本并不多，先生在世时也不过分看重。但其中的《尹文子》，则是先生特别珍视的。据说先生当年走到哪里，行篋中总是带着这部书。即使就寝，这部书也要常常放在身边。先生作古后，此书传给了孙孟晋。先辈遗珍，孙先生自然不敢轻易示人。一九七二年，孙先生年事已高，且患眼疾，担心不久人世，书无归宿。孙先生自称，孩子们都是搞理工的，此书传给他们，恐因不懂而被轻视。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宏富，且有专业人员管理，当是此书的真正归宿。现在把它捐给国家图书馆，既使先人在天之灵欣慰，也使自己了结一件心事。

孙先生所捐《尹文子》虽非宋刻，亦是近于宋刻的元大德本，传世极罕。

建国以来，陈垣先生的后人、邓拓同志的夫人丁一岚同志、刘盼遂先生的后人、刘明扬先生的夫人王静宜同志等，又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书。其中如刘明扬先生旧藏之明抄本《册府元龟》，明嘉靖刻本应槿的《谏狱稿》，万历刻本的《大明律》，以及奏议、文集若干种，都是很难得的善本书。这些私人捐赠，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更加丰富多彩。

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除了国家拨交、私人捐赠外，历来还不遗余力地采访购求。全国各地古旧书店凡收到好书也尽先提供给北京图书馆。特别是北京的中国书店，于五、六十年代，先后给北京图书馆提供过相当数量的善本书。上海古旧书店，七十年代还向北京图书馆提供过咸淳《临安志》。在北京图书馆采购善本书的事例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入藏的一批善本书。

一九六五年，一位居住在香港的藏书家，因某种原因要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十分珍贵的善本书出卖。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人士都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在公务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方面指示有关人员进行联系，一方面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使这批极其珍贵的善本书免流国外，入藏于北京图书馆。周总理还抽出时间一一过目，并指示北京图书馆妥善典藏，提供广大科学工作者利用。

这批书分图书和碑帖善拓两部分。善本图书中有：宋浙刻本《荀子》、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元陈仁子茶陵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元刊本《断肠诗词》；明初刻本《任松乡集》、明翻元大德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盐铁论》、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

参军集》、《汉书》，汲古阁抄本《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以及清代乾嘉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题跋的《水经注》等。碑帖善拓中有：五代或北宋拓本《神策军碑》、《佛遗教经》；宋元拓本《蜀石经》、《嘉祐石经》、《大观帖》；元明拓本《绛帖》，明清拓本《东海庙残碑》等。这些精刻善拓中，如宋浙刻本《荀子》、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元大德陈仁子茶陵东山书院刻本《萝溪笔谈》等，都是传世极罕的珍贵版本。善拓中的《神策军碑》，堪称神品。其上有“秋壑图书”藏书印，说明南宋时就曾为权相贾似道的藏品。这些精刻善拓入藏于北京图书馆，使北京图书馆善本珍藏更加灿烂夺目。

建国三十五年来，北京图书馆通过接受政府拨交、私人捐赠以及主动采购等渠道，使善本藏书大大增加。迄今为止，除敦煌石室遗书、《思溪资福藏》、《赵城金藏》、《正统道藏》等专藏之外，光善本书的珍藏就已近三十万册，比建国前四十年所积增加一倍以上。

当然，作为图书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藏书楼。藏书楼得一珍本，往往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这就私人藏书而言，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图书馆就完全不同了，它应该想方设法使所藏图书为读者所利用，对科学研究、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建国三十五年来，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不但不同于已往的藏书楼，就是比解放前的北京图书馆也有本质的区别。北京图书馆不仅深知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贵，也懂得为读者服务的责任。因此，自建国以来就确定了在保护好善本图书的前提下，恰当使用这些图书的原则。并从五十年代起，就引进设备，将善本书摄制成缩微胶卷，供读者阅览。或提供底本影印出版，或提供校本，整理排印出版，使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为更多的人更广泛地使用。例如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先后

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宋浙刻本《荀子》、《忘忧清乐集》、《金石录》、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孙可之文集》、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清刻本《百尺梧桐阁集》、《龠山集》等等，就都是北京图书馆提供的底本。这些书的影印行世，使许多传世孤本化身千百，也起到了为广大读者和科学研究服务的作用。

此外，北京图书馆还专门设有善本阅览室，每天接待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仅以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为例，就可看出北京图书馆是如何为读者服务的了。一九八一年，全年接待中外读者3857人次，流通善本图书4970种次，17478册次，缩微胶卷1258卷次。一九八二年，全年接待中外读者5827人次，流通善本图书6370种次，28881册次，缩微胶卷2020卷次。一九八三年调整了阅览规则，但全年仍接待中外读者5085人次，流通善本图书5685种次，18663册次，缩微胶卷2363卷次。三年总共接待中外读者14769人次，流通善本图书17025种次，65022册次，缩微胶卷5641卷次。平均每年接待读者4923人次，流通善本图书5675种次，21377册次，胶卷1880卷次。十年动乱前读者略少，十年动乱中有五年未开馆，实际开馆按三十年计，估计接待读者的总数亦不会少于十四万人次，流通善本图书也不会少于十五万种次，六十四万册次。这些数字雄辩地表明，建国三十五年来，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吸引了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而又难得的资料。例如麻醉中草药蔓陀罗花的确认、大同火山是死火山绝非活火山的确定、榆林三迁历史原因的确析、矿藏寻找、边界归属的证实、传统剧目的发掘、古籍整理中的校勘等等，北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对北京图书馆善本珍藏的利用更加频繁，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令人鼓舞。

时逢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简略地介绍一下北京图书馆善本

藏书建设的成就和它所发挥的作用，我想是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最好的节日祝贺。

《诗·邶风·干旄》的主题

《诗·邶风·干旄》是一首描写贵族阶级迎亲的诗。

历来学者对《干旄》主题的解说，多根据《毛诗序》小序说的：“干旄，美好善。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一段话来定的。意思是，赞美卫文公群臣乐于招纳贤士。这样对诗中的一些文字就产生了一些曲解。

细读原诗，首先感到一、二、三章中的“四”“五”“六”三字，并非数词，不是“四匹良马”“五匹良马”，而是动词。“四之”“五之”“六之”，是赠给的意思。“四”“五”“六”并非定数，极言赠了良马之事。加上前句的“素丝”，就是以“素丝、良马”为赠礼。“彼姝者子”的“姝”字，一是指美好，如《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古乐府《上山采蘼芜》：“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指美女，如古乐府《陌上桑》：“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总之，“姝”字是指女子的“美好”、“美丽”。

再统观三章的句法、结构，每章的前两句是写在“浚之郊”“浚之都”“浚之城”出现的一种壮观铺张的场面；三四两句是写素丝、良马优渥的赠礼；五六两句是写“温柔美丽的人儿呀！我再送您什么呢？”第三章的第六句中用了一个“告”（gù）字，应是名词，忠言也。意思是“美丽的人儿呀！我再以何忠言告与您？”表白自己的忠诚之意，感情达到了高潮。三章的句法结构相同，反复咏歌不已。

这种迎亲的风俗，在《诗经》的《齐风·著》《大雅·大明》《大雅·韩奕》中，描述得都极为生动。

可见《干旄》一诗，是一首贵族迎亲的诗，并非招纳贤士的赞美诗

·毛华轩·